

今年特别热，立秋过了，处暑也过了，最高温度竟然38摄氏度。看天气预报，未来还有几天38摄氏度。挥扇只有汗如浆，根据最新排名，南京已不在国内四大火炉之列。环球同此炎，好在有空调，蜗居房间，便假装与世隔绝。

人闲着会怀旧，会想到没空调的岁月。十天前，参加首届乌镇阅读节，在西栅住了两个晚上。旧地重游，主办方有何要求，想看什么地方，于是就想到离乌镇不远的丰子恺故居“缘缘堂”。

缘缘堂在石门镇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与大多数人一样，自己首先是书本上认识的。除了看丰子恺先生的散文，早在少年时代，还听伯母多次说起，也不止一次见过老照片。

最初知道丰先生，是在浙江上虞的白马湖，也就是著名的春晖中学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还在上中学，伯母带我回她的老家。伯母的父亲是夏丐尊先生，夏先生与丰子恺，有着非同寻常的交往。伯母跟我说起了会画画的丰先生，指着一块空地，当年丰先生的“小杨柳屋”，就在这，而那边呢，是弘一法师的“晚晴山房”。那时带，“小杨柳屋”和“晚晴山房”，都不复存在，没了踪影。青山绿水间，两栋供人怀念的建筑，只是一种文化记忆，是空中楼阁，是老照片上的图像。改革开放后，有意义的老房子纷纷重建，历史在迅速恢复，于是两处旧址，才有了今天的模样，供后人膜拜。

十几年前，我带女儿去白马湖参观，跟她聊弘一法师，聊丰子恺的散文和漫画，也附带说说自己的当年。一说起当年，难免怀旧，难免多味。女儿当时心里

怎么想，不知道。她没有打断我，能肯定的就是，年轻人的感受，与我们这些老家伙不一样，也许她感到很遗憾，见到的都是假古董，都是假的文物建筑。

去了缘缘堂

叶兆言

此次从乌镇去石门的缘缘堂，送我们的司机是名80后，与我女儿岁数相仿。小伙子乌镇本地人，跟他聊丰子恺，对离家不远的丰子恺，他几乎不了解。他说，我们年轻人，更多知道的是木心先生，木心才是这里的大名人，是网红。

设定的导航点是缘缘堂，结果到了附近，绕来绕去，不见缘缘堂。问了当地人，才知道应该是“丰子恺纪念馆”。终于看到了丰子恺故居，看到了缘缘堂。我太太退休，喜欢画画，喜欢丰子恺，家里有一面墙，画的都是丰氏风格的小品。参观缘缘堂，她远比我更认真，更激动，一个劲叫好。

很值得看，非常值得，建议去乌镇的朋友，不妨顺便随缘。人不多，也不少，正合适参观。是不是原来的老房子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天气很闷热，好在有空调，而且免费。看纪念馆，看重建的缘缘堂，脑海里很乱，浮想联翩。时空在激烈打架，我想到了《还我缘缘堂》那篇散文，想到了全民抗战，想到了缘缘堂怎么从无到有，然后毁灭，然后再次复建。

对于古旧文化建筑，是否复建，我始终很矛盾，不知道怎么表态。毫无疑问，假的就是假的，远不如真的好，可哪怕是假的，只要像那么回事，总比没有好。文化这玩意，当然是心里有，才能算真正的有。如果心里没有，完全虚无，无论是真，还是假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

儿子爱吃日本料理，尤其寿司，回转寿司最多一次吃了30盘，也爱吃炙烧寿司，看着料理师傅用瓦斯喷枪炙烧鲑鱼肉片，总是兴趣盎然。他却从没想过，昔时没有瓦斯喷枪，“炙烧”如何处理呢？今天中午友人请吃日本料理，他终于见识到了。眼见师傅以烧红的炭块巧妙炙烧鲑鱼肉片，他简直乐坏了，

带儿子去吃饭

傅月庵

吃到嘴里，直说：“好香！好香！”谢谢料理师傅之后，我不烦恼地说：“歪嘴鸡吃到好米，以后天天跟我要好米吃，那我真是麻烦了。”儿子还爱吃咖喱猪排饭。每次带他去吃，他总会指着猪排说：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“喔，你吃就好。”多半答案如此，有时他一问再问，也会吃他一块。但其实，我不太喜欢“你分我吃一口，我分你吃一口”的分食习惯，也不是卫生问题，也不是小气，说不上来：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何必这样夹来夹去？

在我小学二三年级时，有次我的父亲带我到家旁边的馆子里吃面。那是我少有跟父亲出门的一次，他为我点了一碗排骨面，自己吃牛肉汤面。或因家里穷，此前，我所理解的排骨，一直都是人家用来熬汤的大骨，肉少骨头多。没想到这次吃到的竟是小盘装切片的厚肉，还都是瘦的。这是生平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排骨，简直狼吞虎咽下肚，连一眼也没看看父亲，更别说他：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

这么多年之后，每回儿子问我“要不要吃一块？”我总会想起父亲带我去吃排骨面的那个下午，琢磨了很久，得出两个结论：若我问了，依我对父亲的理解，答案应该也是“喔，你吃就好”；事实证明，父亲啊，我儿子还是比你儿子更懂事一些。

写下来就是胜利

薛海翔

蒋近朱是大学同学，微信名叫“近朱不赤”，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。77级一代的不羁，悄然流漾，但是，蒋近朱的经历并不繁复，插队四年，就进了大学。之后，便是三十年的教师生涯，漫长且一成不变的职业轨道，一直铺到那个名叫退休的终点站。

退休，这个职业生涯的终点，在蒋近朱这里，成了起点，一路飞奔起来，勤快笔耕。说起写作，与很多退休后才第一次书写寄怀的人不同，蒋近朱是有童子功的，我可为此作证：1978年11月22日下午1点30分，上海师范学院西六舍219室，我和同为中文系77级学生的叶骏、

汉语与拼音文字最重要的区别，即它的表意性。每个字都有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晰的含义。人们在运用汉字表情达意时，不能不注意审音辨义。古人云：一音之谬，一句为之蹉跎，一语之失，全篇为之涩滞。可见，文章之道，特别讲究用字的安稳。这恐怕也是文坛上流传很多“一字师”掌故的原因。

北京人艺一直流传着一个郭沫若先生称赞于是之先生为“一字师”的掌故。讲的是排《武则天》的时候，于是之建议将剧中一句台词“你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”，改成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”，郭沫若认为改得好，加重了语气，显得很有生气和力量。而郭沫若有一篇《一字之师》，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。文中写到排演《屈原》的时候，他与饰演婬媾的张瑞芳讨论台词，觉得第五幕第一场婬媾斥责宋玉的一句话，“宋玉，我特别地恨你。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，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”，有点不够味，他想在“没有骨气的”后面加上“无耻的”三个字。正在旁边化妆师演说的张逸生插嘴道：“‘你是’不如改成‘你这’，‘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！’那就够味了。”郭沫若说：“听了这话，我受了莫大的启示，觉得‘这’一个字真是改得非常适当。”这其实不难理解，“你是什么”，是单纯的陈述句，自然比较平淡，“你这什么”则加入了感情和态度，就显得强烈多了。

还有一个“一字师”的故事，发生在汪曾祺先生与翁偶虹先生之间。当年，汪曾祺先生创作京剧《沙家浜》，郭建光有一著名段唱，《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》，其中有一句唱词，“芦花放，稻谷香，岸柳成行”，最初写的是“芦花白，稻谷香，岸柳成行”。一天，翁偶虹先生碰见汪曾祺先生，说道：“芦花白，稻谷香”不在同一个季节，不如改成“芦花放，稻谷香”比较贴切。汪先生很敬佩翁先生这位词曲大家，他的《锁麟囊》文辞优美，脍炙人口，至今仍是京剧创作的典范。因此，汪先生对翁先生的建议不敢怠慢，认真思索，推敲一番，觉得翁先生说得有理，遂改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
郑伟、曹旭、蔡鹰扬，成立了一个名叫“晨钟”的文学社，校方特批一排公告橱窗，让文学社以壁报方式，发表文学作品。兹事体大，不数日，《文汇报》即以新闻报道。从此，这一排明晃晃的橱窗，从早到晚，人头攒动，驻足阅读贴在橱窗里我们几个写的小诗、散文、评论及译



作，读者则把阅读意见写成小字报，贴在橱窗玻璃上以为争鸣（有一期小字报达20份之多），斑斓橱窗和涌人流，成为校园一道奇特的时代景观。

不久，我们接受并发表“外稿”——非社员的作品，同学们也以作品能上壁报为荣。1979年5月28日的第12期壁报上，刊出注明“外稿”的一部短篇小说《雪》，作者：蒋近朱，本集子作者的处女作呱呱坠地，就此问世。是年蒋近朱23岁，扎两根短辫，求学如痴，睁眼看世界。

令人称道的是，三十年难免刻板的职业生涯，磨去的是那两根短辫，而那双睁看世界的眼睛，却一如23岁，好奇而专注，潮起潮落的波光激滂，人入往的鼎沸喧嚣，被她凝视记录，被她咀嚼辨析，再用童子功里就有的写作技法，化为篇章。退休后的蒋近朱，不停看，不停写，不知不觉，就有了这本散文集《旅途有风》，130篇文章，堪称洋洋大观。

集子里的每一篇文章，均为作者的直观实录和思绪凝结，文体分类当属“非虚构写作”，笔下的桩桩件件，都是真人真事，所思所想，均为真情真感，如此，这本集子就有了文学以外的价值。历史长河奔腾汹涌，朵朵浪花转瞬即逝，无论怎么晶莹剔透，怎么绚丽诱人，通通无迹可寻；无人知晓就等同不曾发生，那才真叫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。

把浪花写下来，用“写下来”固定那转瞬，它就存在了，就成了滚滚长河中突兀于激流中的礁石，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写下来就是胜利。



我最近碰到一则柳暗花明的事。事情的起因是朋友送给我的徕卡M10-P狩猎版去年出现闪屏，写邮件给徕卡公司询问能否寄去维修，回信告诉我两种选择，一是寄去德国韦茨拉尔徕卡总部，二是寄到上海徕卡维修中心。我的本意当然是寄往德国，但去到邮政局办理快递时，告知邮寄个人物品出境不能报关，二选一的途径只剩唯一，就是交给上海徕卡。收到我寄去的相机后，上海徕卡打电话来说可以维修，价格八千多元。这似乎说明这台相机无甚大碍，心绪稍安。时值春节前，凡事停滞，待春节后，上海徕卡来电话告知，说M10-P的配件徕卡总部迟迟未发货，建议我直接寄往徕卡总部，随之相机被寄返退回，事情回到起点，似乎已无转机，能考虑的办法是在北京寻找维修。

几经询问，果然北京存有配件，维修加配件报价2万元，事已至此，只能接受“贵即是徕卡”的现实，将相机交给北京的维修公司。常言所谓事有巧机，此时临近英国书展，参加书展的出版社编辑听闻此事，应允将相机带去伦敦，曲线转道寄往徕卡总部，这消息令人振奋，赶紧填写维修单陈述故障，正待交付，却巧机再现，朋友的朋友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有合资公司，时常往返，曾国藩有言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真是道尽天机。这位未曾谋面的热心朋友将相机带到德国后，择日驾车去到徕卡总部，约半个月，徕卡发来邮件，提供两个方案，一则维修，二则置换全新的M11-P狩猎版。徕卡最大诱惑是它的怀旧，它所拍摄的色彩情绪，它沉浸岁月磨砺露出的黄铜底色，还有它静音快门的清响，都符合今生今世的伴随。但理智与情怀不能两全，私心里纠结良久，终于选择徕卡置换建议。三番五次的峰回路转意外巧合终有圆满结果。

沉香烟盒里逾千张微微泛黄的名片如秋叶簌簌坠落，一个微型时代的升华逐渐显影，有手写的、纸质印刷的、木片雕刻的……仿佛岁月抖落的鳞片，一时难以言喻。这些镌刻着铅墨字的方寸纸片，见证了无数次的握手、微笑与合作。

数字智能经济时代，人们的联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、即时通讯工具等数字智能化沟通方式，让信息的传递变得更环保、便捷、高效和私密。电子名片的“智能标签”——算法根据场景自动匹配展示各种身份、主要成就等。电子名片以光速在云端流转。人们不再担心名片夹爆满，只需在通讯录标注“来源渠道”。此外，听障人士还能通过电子名片二维码嵌入手语介绍视频，突破纸质时代的信息表达壁垒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，打记事起，战火就像一团驱不散的阴云，笼罩着整个国家。那时总听长辈们说，日本侵略军野心勃勃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谁能想到，连丰子恺、马一浮这样的文人志士，都不得不举家避难，辗转来到桐庐阳山畈湖头上盛宅。尤其是马一浮先生，还在船形岭（今横村镇凤联村）我家住了约莫一个月，后来因战火逼近，才先后离桐西行。那时的我们不懂离别，只记得大人们脸上舒展不开的愁容。

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，30万人的鲜血染红了长江水。离我们凤联村五华里的净土寺，原本乡中心小学和乡政府的墙壁上，家兄画满了揭露日寇罪行的漫画，写满了醒目的抗日标语。可最丧心病狂的鬼子，竟放火烧了整

沉香烟盒里逾千张微微泛黄的名片如秋叶簌簌坠落，一个微型时代的升华逐渐显影，有手写的、纸质印刷的、木片雕刻的……仿佛岁月抖落的鳞片，一时难以言喻。这些镌刻着铅墨字的方寸纸片，见证了无数次的握手、微笑与合作。

数字智能经济时代，人们的联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电子邮件、社交媒体、即时通讯工具等数字智能化沟通方式，让信息的传递变得更环保、便捷、高效和私密。电子名片的“智能标签”——算法根据场景自动匹配展示各种身份、主要成就等。电子名片以光速在云端流转。人们不再担心名片夹爆满，只需在通讯录标注“来源渠道”。此外，听障人士还能通过电子名片二维码嵌入手语介绍视频，突破纸质时代的信息表达壁垒。

从宋代拜帖的泥金箋到民国月份牌广告名片，每次媒介变革都伴随社会关系重组。“媒介即讯息”，当名片从实体转向“比特”，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纸张的触感。那些需要刻意记忆的姓名信息，那些在咖啡馆交换名片时偶然发现的共同爱好等，都在数字化过程中被过滤成规整的数据字段。但或许这正是文明的宿命——甲骨到青铜器再到石头，简牍到缣帛再到纸张，每个时代都在用新的载体雕刻记忆。

暮色渐沉时，我将最后几摞名片整理收进沉香木盒。电脑响起云端软件的铃声，虚拟“名片”在三维空间流转飞舞。这些“比特”流正在孕

子。鬼子掠夺家畜牲畜，常常只割两条腿就扔掉，剩下的烂在路边、水田里，臭气熏天。他们还在沦陷区放细菌、施毒气，富阳城里的“万人坑”，不知埋了多少冤魂。

有段时间，村子里人心惶惶，时不时就有人说“鬼子来了”，大家拎起包袱就跑了。鬼子夺家畜牲畜，常常只割两条腿就扔掉，剩下的烂在路边、水田里，臭气熏天。他们还在沦陷区放细菌、施毒气，富阳城里的“万人坑”，不知埋了多少冤魂。

跑，连鞋都顾不上穿。炮声由远而近，时局愈加吃紧了，我父亲为安全起见，让我跟着大姐避难到犹如世外桃源的高山姑夫家。他家有惠忠、惠堂、惠勇三个儿子，姑夫要我过继他家，为我起了惠扬名字。大姐自小与惠堂订的娃娃亲，全家老少与我亲如一家，晚上大姐抱着我同枕共眠，让我在战乱期间过上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！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，以为苦日

子。鬼子掠夺家畜牲畜，常常只割两条腿就扔掉，剩下的烂在路边、水田里，臭气熏天。他们还在沦陷区放细菌、施毒气，富阳城里的“万人坑”，不知埋了多少冤魂。

柳暗花明的事

杨小洲

抗战流亡记忆

黄宾笙

跑，连鞋都顾不上穿。炮声由远而近，时局愈加吃紧了，我父亲为安全起见，让我跟着大姐避难到犹如世外桃源的高山姑夫家。他家有惠忠、惠堂、惠勇三个儿子，姑夫要我过继他家，为我起了惠扬名字。大姐自小与惠堂订的娃娃亲，全家老少与我亲如一家，晚上大姐抱着我同枕共眠，让我在战乱期间过上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！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，以为苦日

十日谈

80年：追忆、追问 责编：刘芳 沈月明

中国学者应走向国际舞台，推介成果，针砭谬误，捍卫正确的二战史观。